

韩经太著

心灵现象的艺术透视

大文学史观丛书

209

现代出版社

主编：傅璇琮

编委：（按姓氏笔画）

王学泰 王 毅 许逸民

葛兆光 董乃斌 傅璇琮

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

（大文学史观丛书）

韩经太著

※

现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188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ISBN 7-80028-062-4/I·013

定价：4.90元

作者简介

韩经太，男，1951年生。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语文系。著有《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等。

* * *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文化透视与美学分析相参融的视角出发，以典型个性的剖析带动整体风貌的考察，多方位地描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世界及其在古典诗歌中的艺术表现，从而阐释和解析了有关的诗学课题和诗美境界。

《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

“日新之谓盛德”虽是句老话，却更成了今天世界的潮流，其流波所及，使文学史研究这古老的学科也开始审视自己久已用惯了的规矩和绳墨。于是人们感到，在旧方法的种种不便中，最主要之一即是视野之狭隘。文学本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晶，而生活本身是极其广阔的：从横的方面来说，它包括了衣食住行、耕桑织铸、婚丧祭祀、科举官制、市井田园、三教九流、琴棋书画、游历著述……等等一切人类文化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从纵的方面说，它又包括了从上古至以后历代一切文化的具体演变过程，而文学唯有在这深厚、广袤的土地上才得以孕育和成长。如此显见的事实被忽视得太久了，文学史研究也就难免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圈子里打转儿。经过多年的拘墟守隅之后，我们想到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借“不大通，何由得大有”（王弼《周易注》）的哲言来说，“大通”是我们的方法，而“大有”则是我们的期望，这也是我们把这套丛书冠以“大”文学史“观”的缘由。

当然，“大”也有大的难处，因为这不仅需要观念和方法的

更新，而且需要知识领域的拓展；不仅需要了解个别的文化门类，而且需要了解诸多文化门类间的联系；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时代文学与文化的联系，而且需要了解整个古代文化进程中这种联系的多种样式和繁复形态，等等。所有这些，都要靠切实和持久的努力，而不是靠释贩应时的包装就能完成。中国古代文化本是个巨大的体系，又由于以往极少整理，就越显得庞杂。所以，这套丛书总的目的固然是融会贯通，然而具体的研究却必须从披沙拣金做起。当年，鲁迅先生从药、酒之类寻常微末的文化载体入手，揭示了整整一代士人的生活、心态和那时文学的面目。他的方法不务新巧，只见平实，然而今天回顾起来，反有历久弥新的力量。

文学是人学，古往今来，无论是文化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都要通过作者情态，去影响文学创作。忽视了这一点，想要“打通”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过去一些研究者正应了庄子那句老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他们不重视文学的主体——人，不重视作家的心态，用排比事实、罗列材料代替作者灵魂的追索和剖析。要真正了解文学作品，就要深入到创作主体丰富而又活跃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的开启，将会大大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

我们这套丛书带有尝试性质，但我们相信它将会给目前的研究贡献一点活力。我们当然也尊重写作者的学术个性，尊重他们独立研究客体对象的探索精神。同时我们希望本丛书的行文风格，尽可能做到轻松而有韵味，不要像读以往一些论著那样，如同观看重量级的举重比赛，使人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期待着有识见的批评和建议。

导 言

“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尽管关注的角度和关注者的立场有种种不同。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应该是文学——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关注，因为它不仅把人们的关注引向了探索心理世界的层次，而且以其审美创造的超越性，使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与文化历史贯通起来，从而使人们有可能穿透生活经验的表层而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背景中去。人们已经发现，尽管当代文学所关注的只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但它所揭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却显然与传统的文人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当代的文学评论家在分析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之后，特意指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部坎坷的历史，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的人格理想作为最后的精神屏障，‘兼济’与‘独善’，‘不屈’与‘不移’的儒家精神是他们的深层心理基石。”（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也许，生活中相应的角色和作家在有关形象的塑造中并不曾自觉到这一点，甚至在听到评论家如此这般的分析后，会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会惊呼：你搞错了吧！那可能只是历史的巧合——不！心理的巧合。然而，偶然之中却有必然，人们将会发问：何以会有这种“历史——心理”的巧合呢？人们由此而将陷入沉思。

评论家们曾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那种屡经摧折而忠贞不二的心理与“逆来顺受”的农民心理联系起来，并最终归结为民族性格的“忍从性”。毫无疑问，这很合乎现在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即为不同的社会心理现象寻找同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本源。不过，这里似乎忽略了什么：知识分子在通过“劳动化”而将其心理世界改造为农民式心理之前，其自身独特的心理世界究竟体现着怎样的传统文化精神？由此再进一步，民族性格的传统模式，在知识分子身上和在农民身上的显现又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为典型？那种与农民相通的知识分子的忍从心理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看来，在那些显得明确而肯定的断语背后，隐藏着一种认识上的隔膜。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心理的考察来说，之所以产生这种隔膜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对于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考察来说，则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

现在，人们显然已经有了消除这种隔膜的愿望了。文化反思和文学“寻根”的思潮正把人们推向心态探索的领域，从当代文学的思维轨迹中就可以看出，人们有一种心理上的需求，企希着去重新把握历史，尤其是中国民族的心灵史。在一定程度上，这首先就意味着去把握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如今正处在重新塑造自我的关键时刻，而那新的民族形象是不可能凭空雕铸出来的，需要在文化历史的反思中确认自我的价值，以期于调整整个民族的心理重心。在这民族自塑的新基点上，知识分子处于重要而敏感的地位，因此，文化历史的反思自然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分子价值的再认识。无疑，知识分子现在不仅需要从旁边冷静地审视自己，而且需要

在历史的反思中去辨识和把握自身价值的文化渊源和基础。比如，那种显现在当代知识分子文学形象身上的忍从心理，当它被抽象为儒家所倡扬的人格理想时，究竟是一种精神的褒奖呢，还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在这里，人们显然要遇到价值判断的困难。于是，要么继续在迷乱中怅惘，要么争取在反思中清醒。

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化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用文化史来代替。执着于抽象概括的理论家们，总喜欢“一言以蔽之”式的论断，而且习惯于从古代哲学思想的范畴直接跳到有关心理分析的范畴，在其主观阐释的模式中，文化精神指向人格理想，人格理想指向文化精神，这固然能以心理哲学的抽象思维给人们深刻的启示，但总显得缺少一种必要的东西，那就是心理世界所固有的丰富形态和生动特性。唯其如此，我们倒是倾向于心理艺术的心理现实的分析。也许，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却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现实——心灵的现实，将比由哲学观念所阐发的人格理想复杂得多，而使这种现实成为心灵世界之秘密的心理艺术，也远比哲学观念来得微妙。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吧，人们现在需要一个透视心理世界的特殊窗口，而它正是具有无限魅力的古典诗歌艺术。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特性正在于它的抒情性，而这种抒情性又受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的导引和“纪言”“纪事”的历史意识的影响，使它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之心理真实的写照。透过古典诗歌的感慨咏叹和抒写描述，参之以相应相关的文史材料，我们就能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在这里，传统的哲学思想已不再是超然于生活现实之上的观念体

系，人格理想也不再是游离于现实情感和生活个性之外的幽灵，而是与社会政治现实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践相碰撞着融会在一起了；在这里，我们将能非常具体地了解到，那体现着儒家精神的“兼济”思想怎样与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结合为一体，并在怎样的前提与条件下与“独善”相统一，而“兼济”与“独善”又怎样相互制约着形成复杂多变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方式；在这里，我们还将饶有兴味地发现，生与死的冲突，怎样一方面被调谐为生命智慧，而另一方面又化为人们的生活和艺术想象；在这里，情绪的冲动和道德的自觉，人生的需求与人格和完善，曾以当今人们难以意料的方式相组合，同时也以其难以意料的方式相冲突；……总而言之，在这心理真实的世界中，我们不仅将发现许多并不熟悉或者是似曾相识却又不及体味的现象，而且将切近地体会到远比其哲学体系为丰富的儒、道、佛相击撞而相参合的心理运动。所有这些，在诱惑着我们，也在提醒着我们，许多既定的观念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了。

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大概早已习惯于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作新旧两代。当然，这里所说的新与旧，是指从文化观念出发的认识，而不是指以政治斗争的标准所作的划分。文化观念上的中国新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本世纪初以来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所谓中国旧知识分子，自然是指民族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大夫文人了。新知识分子主要受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他们对民族启蒙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实质上是以借西方文化之光来烛照东方民族之心这一主体意识为核心的。唯其如此，在他们实行与传统文化的决裂时，也就产生了对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拒斥。于是，当他们在寻找民族衰落之根源时，一方面在指责往

日学问之非，一方面便指责士大夫心术太坏。在又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摸索之后，当今的中国人怕不再会全盘接受这种看法。但是，一种近乎宗教忏悔的心理却隐然存在于有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使他们只能以表示拒斥传统来证明自己意识的现代化。与此相反，则又因为要克服这种心理而产生了眷恋传统的心理。这样，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西学为体还是中学为体的争执始终相持不下，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却因此而始终不能深入。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被概括为士大夫意识，而它或者被理解为因循守旧、封闭愚滞，或者被理解为清心淡泊、不务实际，又或者被理解作忠心事主，矢志不二。总之，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士大夫意识要么被确认为对人格理想的执着，要么就被确认为对封建礼教的固执。不难看出，这里缺乏一种以探究知识分子心理为目的的独立的学术研究，一切都被现实功利的实用态度所支配了。于是，不管是对所谓士大夫意识持嘉许态度者，还是持贬斥态度者，也不管是流露出欣赏之意者，还是表示出不屑一顾者，都不免是在证明或反证他们自己的现实抉择。在狭隘地、机械地发挥“古为今用”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人们终于既未能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也未能彻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真实。的确，过于计较实用的指导思想，使人们变得短视，而这短视的目光，使他们既不能远瞩未来又不能反顾历史，从而也就不自觉地使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事与愿违地封闭化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绵延了两千年之久的心灵历程重新进行考察和剖析。在这种考察与剖析中，人们将有机会思考许多问题，并有可能在大量生动材料的基础上

作出理性的判断。比如，儒家思想和专制政治、封建礼教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又比如，传统的理想人格是如何容纳着儒、道、佛三家思想精神的？还有，士大夫意识与传统的农民意识是一体的吗？它是否具有对商品文化和市民意识的认同机制？由此引发的思考，还可能延展到中西文化的异同以及人类良知和民族气质的关系等问题。总之，这一切看上去似与现实无关，似乎无涉于我们当今的价值选择，而实际上却远不是这么回事。许许多多牵连着现实神经的文化历史之谜，只有深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史之中才能求得解答。

从春秋之士到秦汉之士，从魏晋风度到盛唐风采，从宋元文人的性情到明清士大夫的志趣，包孕着历史变迁的风云，含茹着艺术创造的甘辛，那将是一个何等生动的心理世界！先贤遗风与各代时风的激扬，传统精神与现实形势的交织，理想人格与人生实践的撞击，道德规范与情感个性的冲突，共同构成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运动，记载着古代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历程和心灵跃动的曲线。他们那人格的自觉与精神的超越，人生的抗争与人性的扭曲，还有生命的养怡、志趣的陶冶，乃至事业的成败、情爱的得失，等等，无不或隐或显地体现着哲学思想与政治体制、道德理想与礼教规范、人生智慧与宗教迷信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沉静下来去了解并理解这一切，就如同去读一本关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百科全书。然后，再去分析思考，探求这些古代知识分子以坚韧的意志所作的不懈追求，并辨识如此追求所留在他们心理上的种种痕迹，我们兴许会变得聪明起来，从而真正明晓中国民族振兴的关键何在，而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何在。

目 录

导言	1
一 先贤遗风——士的先赋特质	1
(一) 在“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的时代	2
(二) 多元的精神世界：儒士、 游侠、隐者	12
(三) 称《诗》以喻其志：学诗之士	24
二 屈原的精神——中国文人的忧患 意识与幽独情怀	34
(一) 忧患：怵于危亡，超于利禄	35
(二) 幽独者的自我完善：悲剧心态	44
(三) 贤人失志之赋作：布衣精神	52
(四) 《离骚》遗韵：比兴规范	58

三 扬雄之自守——历史演进中的心

理调整 65

(一) 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形成以后 66

(二) 历史反思：世异事变 73

四 阮、嵇风范——中国文人的韬晦

心理与放诞作风 84

(一) 理性：奉时恭默，咎悔不生 85

(二) 放诞：至慎与至真的矛盾统一 94

(三) 狂醉心态：从竹林七贤到饮中八仙 101

五 何晏，始作俑者？——中国文人

的生命智慧 110

(一) 痛苦的觉醒：从《古诗十九首》说起 111

(二) 纵欲，游仙：生命快感与艺术想象 119

(三) 养生、达观：生理的调谐与精神的
调谐 129

(四) 清江明月之思：宇宙人生的咏叹
主题 135

六 陶潜与王维的追求——中国文人

的自然意趣与超然心境 143

(一) 可游可居之趣：自然风物与自然之道 144

(二) 归返自然的心灵历程 153

(三) 通向静界的适意之路 164

七 白居易的自我剖析——中国文人

的人生理想与处世之道 174

(一) 愿为辅弼的理想与文官政治的特性 175

(二) 穷达遭遇与仕隐出处 186

(三) 讽谕之志与闲适之趣	195
八 韩愈如此说:“诗穷而后工——	
中国文人的感伤情调与悲愁为美的艺术	
心理	206
(一) 精神与实践的双重传统	207
(二) 人格自塑与自我排遣的统一	216
(三) 人生悲凉感与历史悲凉感的交融	223
九 元、白风情——中国文人的情爱	
心理及其艺术表现	232
(一) 现实矛盾与心理矛盾	233
(二) 彷徨于爱与惧之间	242
(三)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248
十 苏轼的典型意义——文化精神、文	
人心理、文人诗画	256
(一) 人生志趣与思维理性:主体精神的	
文化内蕴	257
(二)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心理悲喜剧	267
(三) 理趣、谐趣,禅趣、画趣	277

— 先贤遗风——士的先赋特质

熟悉中国诗歌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文人每有借古人之酒杯以浇自家胸中块垒的习性，所以，那咏怀抒情的诗歌世界，往往透出怀古咏史的艺术气息。别的不说，这只要品品阮籍的《咏怀》和左思的《咏史》就可以理解了。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人的现实思考，是藉历史反思来实现的，而他们的自我观照，又是藉反观他人来实现的。正如陶潜所表白：“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在历史殿堂的深处，树立着往哲先贤的楷模，昂奋的灵魂来这里寻求激发，疲倦的灵魂来这里寻求抚慰，从殿堂深处吹来的幽悠之风，使这些古代的文人诗客们清醒、惊觉，于是自觉到：我是谁？如诗人杜甫，晚年流落于江陵、夔州一带，作有《咏怀古迹五首》，前人在评析这一组律诗时，早已中肯地指出，首咏庾信，乃是以飘泊类是而借以发端，次咏宋玉，又是以文章同调而遥相惜怜，再咏明妃，分明因高才不遇而寄寓感慨，末咏先主、武侯，则是有感于君臣之际的知遇相得。诗人从生活的背景中呼唤出一个个古人，如同呼唤出一个个自我，在彼此交心中，使自我的心理世界具有包容历史的深广度。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中国文人最好登临赋诗，当他们登高远眺之际，透过浩渺的历史烟尘而“怅望千秋”，便与夙所企慕的先贤们心心相印了。审视这

种现象，我们发现，中国文人的“人格自觉”之转化为对历史人物之“人格价值”的现实肯定，已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表现方式的问题，而分明是创作主体之心态构成的一种基本特征。换言之，当那些先贤的人格每每在后人的诗思中复现时，就不仅仅是一种眷恋往古的心理表现了，它至少已经说明，中国文人的心理世界，早在远古时代，就确定了基本模式，就生成了基本因子。这个远古的时代，正是那个异常动乱，却又充满活力的春秋战国时代。鉴于此，就像人们在考察长江时必须于顺江漂流之前先去探究其源头的秘密一样，当我们想要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中国文人的心态世界时，就不得不首先将探究的目光投向历史的深远处。扫开厚重的历史尘埃，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文人，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社会阶层和创作主体的中国文人，是在一个怎样的社会文化母体中孕育并诞生的，其先天秉赋的精神气质究竟是怎样的，而诗之神又是怎样降临到他们的心灵之中的。

（一）在“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时代

《三国演义》的作者声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依他的观点，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就像月亮之有盈亏一样，至于极端而反。翻翻一部中国史，倒也确乎如此，殷周之后，有春秋战国，秦汉之后，有南北朝，隋唐之后，又有五代十国，等等。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历史表象，在实质上，每一次的分裂和统一，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内容，绝不可以视之为简单的历史重复。尤其是对“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的那个时代，更当另眼

相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一个“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时代，对于中国文人的心理构成，具有异乎寻常的先天的作用。

当然，这种“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时代特征的生成，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而这一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正是士阶层终于能参预社会政治之所以然。在周室衰微而礼崩乐坏之前，士的地位并不很高，无论是殷商之士，还是西周之士，都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下层人士。《左传·昭公七年》有一段记述，说明在人分十等的情况下，“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自“皂”以下，凡六等，都是奴隶，自士以上，凡四等，都是奴隶主，而士正处在奴隶主阶级的最下层。当然，就士本身而言，也是存有等级的，“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礼记·王制》）。不过，无论如何，士的整体依然属于下层贵族，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周灭殷以后，采取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诸侯由天子分给疆土，谓之“邦”，卿大夫又由诸侯分给采邑，而士又由卿大夫分给禄田，其中，诸侯是天子的子弟，卿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士又是卿大夫的子弟，尽管同属贵族，但由诸侯到士，经济地位益低，血缘关系也益远。到了士的子弟，已经无所特权，不得不自食其力，更何况子弟之子弟！唯其如此，从本来的意义上讲，士阶层就是周天子宗法制国家中潜在的离心力量。

《谷梁传》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根据后人的解释，“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唐六典》三《户部尚书》）。很清楚，四民的区别，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同。